

我將藏書贈母校

徐貽聰



自由談

我喜歡讀書，也寫過幾本書，還很願意收藏書籍。

幾十年間，在我收藏的書籍中，有政治類的，有歷史文學類的，由於從事的是與國際事務有關的工作，更收集有不少關於世界事務的報道、評論和各類名人的傳記類圖書。當然，為便於寫作，我收藏的辭典、字典和包括中外不同版本的百科全書在內的工具書也真的不算少。此外，我走過不少國家，特別希望做的一件事是尋找每個國家具有代表性的畫冊，帶回來的大概接近四十冊。我沒有認真統計過，但我收藏的總數應該大大超過一千冊國內外正式出版的書籍。這些書我基本上都讀過，至少也是翻閱過主要內容，或者梗概，讓我受益匪淺，所以對之非常珍惜。

我很愛護這些書籍，視之為「珍寶」，還會設想將之作為「傳家寶」留給子孫。所以，不僅在每次搬家過程中小心翼翼地悉數攜帶，還在最後一次遷徙前定做了一組兩米高的古式書櫃，將一間房屋塞得滿滿當當。我將書籍分類存放其間，就連書櫃頂上的空間也被全部利用起來，但仍有部分不常用的書被存放於他處。此情此景，給我的是不時的驕傲感和成就感。

喜歡讀書，也必然考慮書籍的用途。隨著逐漸變老，子孫們又另有閱讀途徑，我在給我的圖書尋找「出路」的過程中，想到是否可以讓它們去我就讀過的中學母校。

我的中學母校是「江蘇省淮陰中學」，創建於一九〇二年，初名為「江北大學堂」，幾經易名，最後於一九七八年定為現名。該校不僅在省內，就是在全國，也屬名望很高之列，被國內多所高等學校爭相列為生源之地，包括清華和北

大等知名大學。據了解，學校成立一百一十多年來，已經培養出數十萬名學生，進入了國家的各行各業和社會的各個層次，很多人還都是其所在行業帶頭人或者中堅力量，對國家的發展作出過傑出、重要的貢獻。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我曾經在這個學校就讀過五年，從初中二年級到高中畢業，對它一直懷有崇敬和感恩之念。多年來，我每次回故鄉探親，必定會到學校去轉一圈，以解思念之情。為了避免麻煩，我往往是在不通知校方的情況下，由家人陪同在學校的幾個校區走走，看它的發展變化，比較新老環境的異同。雖然我就讀時的教室、宿舍均在發展改造中盪然無存，但我對之的情懷始終如舊。

幾經斟酌後，我向母校的領導進行了捐贈書籍的試探。他們對此甚為高興，表示願安排車輛來北京運走書籍，並在學校圖書館內列名安排專櫃存列。我則告訴他們，如果願意接受，我將會請快遞公司上門來包裝、運輸，毋須學校派人派車往返二千里前來；至於擺放，可以按照書籍的內容，與圖書館的其他同類藏書一起陳列，供師生借閱，不要專門陳放，更不要具名。對於前者，他們同意了；至於不具名專放的要求，他們沒有表態。由於書籍捐出後，我尚未有機會回過故鄉，尚不知擺放的情況如何，但無論如何，它們應該已經在師生可以借閱的範圍之內了。

我的書架空了，但我的內心卻是滿滿的，因為我相信，我的那些圖書又可以發揮它們應有的作用了。書籍，問世的目的就是讓人閱讀，給人以知識和啟迪，躺在我這裏，它們起不到這樣的作用。

一件小事，但帶有的是我對母校實實在在的感恩情懷和對社會做點有益事情的真誠情結。不是嗎？我自信如是，所以非常樂意地去做。

讀大書與讀小書

游宇明



如是見

我向缺少讀大書（多卷本或系列圖書）的勇氣，五年前，一時心血來潮，在購書網站買了一套十四卷本的《清稗類鈔》，至今一卷也沒有讀完。真不知三十年前是如何讀完十來冊的《李自成》的，換到如今，不打五百軍棍，我大概下不了如此決心。

對讀小書（單本圖書），我似乎情有獨鍾。岳南的《陳寅恪與傅斯年》、劉青松的《天朝的天窗》、任俊復的《非常規則》、張宏傑的《曾國藩的正面與側面》、傅國藩的《民國年間那件事》、張昌華的《百年風度》等等都是我非常喜歡的。

遇上好的小書，我總是讀得磨磨蹭蹭，一個小時只讀十來頁，生怕錯過了有見識、有趣味、有情懷的地方。我讀小書喜歡手持紅筆，一有感想，就「喇喇喇」地記在空白處。比如《陳寅恪與傅斯年》寫到陳寅恪授課帶有明顯的長沙口音，而且無系統，想到哪講到哪，我在旁邊批道：「此君在今天會被視為『不合格教師』」。比如《曾國藩的正面與側面》寫窮得每年都要借錢的京官曾國藩做了一次四川主考，發了筆小財，立即給家裏寄去一千兩銀子，雖然這些錢只夠家裏還清債務，但他仍然堅持要家人拿出其中的四百兩接濟同族、親戚，我在旁邊批曰：「家境稍有改善，即大舉接濟親朋戚友，足見曾氏的仁愛之心」。《非常規則》裏談到清

代的清官多不得志，我在後面批道：「清官常常攪了同僚、下級的貪腐機會，自然會失去『群眾基礎』；清官沒有錢賄賂上級，『朝廷』也就沒有為他說話的人。下面無人舉，上面無人推，其官運可想而知」。

喜歡讀小書，當然有時間上的考慮。

我是個大學老師，表面上看，每周只有幾節課，瀟灑得很，但備課、出題、改卷、指導論文，頗耗心血，它比上課所花時間多出十倍以上。我業餘從事寫作。寫作要找素材、構思、撰稿、修改、投寄，是一篇千字文花上數個小時，是家常便飯。老婆上夜班，回來得比較晚，中餐、晚餐都必須搭把手，於是時間像被刀子切過一樣，一節一節的。每天保證兩個小時的閱讀，已經算是「擠牙膏」，很難有心情閱讀大部頭著作。

在個人的感覺裏，搞創作與做學問閱讀的方式也不一樣。做學問需要專精，需要明確的方向性，自然應該多讀大書。比如我們研究清史，有關清朝的主要原始材料最好都有所涉獵；我們研究魯迅，讀完《魯迅全集》是一種起碼的選擇。搞創作則更看重學識的淵博、多樣，必須「轉益多師」。與其讀某一個系列，不如什麼牛人的書都看一點，這樣，我們吸取的精神養分會更加均衡，寫出的東西也更有荷花般的清氣。

閱讀需要的是用心，是將知識變為技能的本領，讀大書，還是讀小書，並不標示一個人的境界。

埃爾文52號的新舊主人

小冰



哈佛散記

或許你會說這個故事與你無關。其實社會和人生，是由千百個無關與有關組成，我們從中見識你我他。

帶小女兒參觀她的出生地，我有幸重訪哈佛校園。受邀，我們拜訪了我的兩個小朋友，一對夫婦，也是我們大女兒DX的同學，DX已畢業離開波士頓。聽說我們到來，電話那頭響起Y甜甜的聲音：「阿姨，好高興能見到你和妹妹呀！」

眨眼功夫我們到了他們樓下，夫婦二人已經迎候在門廳。看着周圍的一切，我心中突然一喜：「天啊！這不就是十八年前我們住過的地方嗎？埃爾文街五十二號，從森林街八號搬過來的呀！兩處離哈佛中心，步行都只需五、六分鐘。」

這街道、門牌、扶欄、樓梯，多麼熟悉的環境，他們竟然也租住於此！我不禁驚訝道。「不會吧！阿姨，您確定沒有記錯嗎？怎麼會這麼巧！」搞得他們也不敢相信。「沒錯，照片為證，不只一張。」我肯定地說。

上樓前，他們又說：「如真是這樣，說不準

還有更多的驚喜啦！」聽他們這麼一說，我忍不住又問：「不會是二樓吧？」走上二樓，他們真的止步了。「就是這裏啦，還真是同一層樓！」男主人X興奮地說：「阿姨，請檢視，您確定這是十八年前居住過的地方嗎？現在是我和Y的家了。」世上竟有這樣的巧事，一時間，我們雙方都激動起來。

套句大家愛說的話「這世界太小大小」。他倆和我大女兒DX是清華大學本科期間的同班同學，也是非常好的朋友。之後三位又都被哈佛錄取，同在哈佛讀研究生，X和Y現在是夫妻，現在又湊上我們。你說這巧合、關係、感情，說不奇妙都難！

我仔細搜尋室內外的事物，搜尋那些能夠喚起記憶的東西。廚房的布局依舊；床和寫字台，他們擺同樣的位置；暖氣設備還在那角落，用它，我給小女兒烤過衣服；窗戶依然是抬起放下式；扶手樓梯，那裏我抱着小女兒依欄而立，與上樓下樓的曉燕和Margret說話，住三樓的哈佛教育學博士曉燕，是公寓裏我們唯一可以與之說中國話的人。

賓至如歸，成為我進入房間的真實感受，舊

事我尋找新的東西。其中之一，是擺放嬰兒床的位置，現在擺着工作台，台上攤的圖紙，是X與哈佛設計學院教授合作的設計方案。

戲劇性的人生，竟然發展得如此天衣無縫。女兒與他們，我們與他們；我們租住的房舍，他們租住的房舍；當年我們的家，現在他們的家；當年的嬰兒，現在亭亭玉立的女孩。這不是偶然啊！我們沉浸在因與果的欣喜中。

十八年了，埃爾文五十二號的主人不知換了多少輪，當中不知多少歡喜多少愁。如今依然是這條街，這棟房，這套公寓，我的時光好像被打住了。哎呀！這篇文章一定要寫。

心情另有一番歡喜，風景就另有一番好看。午餐後，小朋友夫婦陪我們漫步埃爾文街頭，我給大家講述當年的一件事。那年早春，還等不及天氣足夠暖和，一位性急的鄰居就在花園裏種上含苞待放的花草，之後含情脈脈地等待，等待它們為環境增添色彩。可是兩天後天氣突然降溫，花兒被凍得奄奄一息，搞得那位愛花人非常沮喪。那天路過她家，她對我說「我感到沮喪」。那表情，真是可愛極了。

（哈佛散記之三十，逢星期三刊登）

香港，說不完的故事

徐海娜



HK人與事

一座城，就像一個人，你與她的感情怎樣，並不在於你和她相處得有多久，而在於你對她了解得有多深。

小思（盧偉鑾）是一位研究香港和內地文人的學者及作家，她總是用她的作品和行動，讓更多人更加了解香港這座城，從而懂得怎樣去愛和珍惜她。十月三十一日，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的展覽「曲水回睇：小思眼中的香港」落幕了，小思老師的話語卻仍在我耳邊迴響。

「你聽過一條叫屋蘭士里的小街嗎？你當然知道那裏有一間著名的聖士提反女子中學。斜坡上，綠樹成蔭的小花園，鐵閘永遠用鏈子鎖住，多麼恬靜和幽美。蕭紅的一半骨灰，就埋在這裏，一棵大樹下。」小思老師如此說。原來，這裏藏着一個美麗的爱情故事。

一九四二年，蕭紅在香港病逝，年僅三十一歲。這位上世紀中國文壇的才女，曾被譽為三十年代的「文學洛神」。深深愛着她的端木蕻良，她的同為作家的丈夫，在那個兵荒馬亂的年代，仍設法將她的一半骨灰葬在了美麗的淺水灣，另一半骨灰則安葬在聖士提反女子中學的一棵樹下。

當時的聖士提反女子中學被用為醫院的臨時救護站，蕭紅病重的最後時刻就在那裏度過。端木蕻良本來想把另一半骨灰帶在身邊，無奈時局艱難，為了安全起見，他決定暫時把它

埋聖士提反女子中學的花園中。

這本來是一個塵封已久的故事，這次中大為「曲水回睇：小思眼中的香港」舉辦的一系列活動，又引起了人們對那些與香港有關的文人故事的好奇心。

原來蕭紅和端木蕻良的結合曾經受盡世人的諷謔，他們的作家朋友們也曾經質疑過他們的感情。然而，蕭紅去世十八年後，端木蕻良才再婚。他後來的夫人鍾耀群女士回憶說，一九六一年那個秋天，在幫端木整理雜物的時候，看到了一個寫着「蕭紅遺髮」的舊信封，裏面有一小縷不齊齊也不大柔軟的頭髮。她說：「從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二日到那時，幾十年的歲月，基本上是在流浪、動亂中生活的端木，物品散失殆盡，特別是在經歷了『十年浩劫』後的今天，卻奇跡般地珍藏着蕭紅的遺髮，對他這種感情，我是珍視的。」

端木蕻良晚年的時候，小思老師曾多次邀請他來香港，可惜因身體原因終未完成心願。小思說：「一九九六年，端木蕻良去世，他的太太寫信給我，說端木蕻良的屍骸已經火化，她也是將骨灰分成兩份——『我已經將一半的骨灰收起，另一半我好想、好想放在聖士提反的花園裏，讓我丈夫的骨灰可以和她所愛的女人的骨灰在一起。』」後來，端木的夫人鍾耀群果然拿着他一半的骨灰，來到香港的聖士提反女子中學，把骨灰撒在一棵樹下。小思說：「一個女人把自己丈夫的一半骨灰分給另一個女人，我再沒有話說。」

蕭紅的重要作品都在香港這小島上完成，蕭紅的爱情故事，也永埋在那幽幽小園裏。」小思在她的《香港文學散步》一書中，如此寫道。除此之外，還有蔡元培、魯迅、許地山、戴望舒、張愛玲等曾南下香港的文人與這座城的絲絲縷縷也被收錄在這本書中。這本書自從一九九一年在香港出版後多次增訂和再版，二〇一五年又在內地出了新的增訂版。許多人都按圖索驥去尋覓那一個個承載着上個世紀文學記憶的地標。

也許你我也可以隨着過去那些文人的足跡重新看一遍香港，跟着小思重遊舊地，比如「孔聖堂」，在上世紀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主張新文學的郭沫若、茅盾等人都曾在此演講。小思說：「香港是個特別的空間，紀念孔子的殿堂居然可以借出來讓反孔人士舉辦活動，就突顯了香港是一個自由、沒有成見的地方。」書中還提到半山的「學士臺」，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〇年，聚居在那裏的都是中國著名的文化人。小思說：「當時的文化人，天南地北什麼也談……我們應該珍惜這個自由空間。」

中大這次展覽正是配合小思「文化人眼中的香港」口述歷史訪談計劃，以回睇的方式來追尋香港面貌的。「我們必須多認知香港的身世，才可漸漸理解，才可關愛她。」小思說。經過了多少年的滄海桑田，有的人已經被時代的波濤吞噬，有的人還在時代的洪流中泅渡，這座城不知還隱藏着多少動人的故事，等待着後來人去發現、去流傳。

懷念爺爺熊式一

熊繼周



人與事

在牛津的第二天一大早，帶着回家的情懷拜訪了爺爺曾在英國牛津最風光時候的住所 Grove House、也是父親時常提起倍感溫馨和充滿着親情回憶的家：那是一座氣派非凡的豪宅，院門一開，踩着圓潤的鵝卵石，幽靜的小路兩邊全是蒼翠的樹木。青蔥草地鋪滿巨大的花園和緊鄰的小菜園。一棟兩層樓的白房子矗立在我們眼前，新房主熱情迎接我們進了客廳，地上仍然鋪着當時的古木地板。那些過去看過的有關家人在這間房子的照片，全部像電影一樣歷歷在目：好似爺爺奶奶仍在下着圍棋，大姑、父親、叔叔、小姑四兄妹有說有笑地也有讀書的圍繞在他們身旁。在《王寶川》轟動英倫及美紐約舞台後，姐弟三才被接來到倫敦讀書學習的，並前後考進牛津大學，修讀英國文學和歷史。小姑也是那時在倫敦出生的，有趣的是，一出生就命名為「寶川」。正在我目不轉睛地欣賞房屋的時候，房主微笑地為我展示了一張從牛津名建築史料庫尋到的這間房屋的黑白相片。照片中爺爺手把手教着姑姑寫書法，我猛然又想起，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們在香港界限街的家裏，當時他老正趕着翻譯《大學教授》一書，讓我幫忙代筆寫下中文譯稿。爺爺每次看到我寫的潦草的簡體中文字，總是略帶失望的語氣責問我那些變形字的意思。記得他指着字體「廣闊天地」的「廣」字問我：「這是哪家的中文字？」我揚着聲音挑着眉毛高傲地回答：「廣州的『廣』啊，一點一橫一撇撇到南洋呀！」心裏嘀咕着：「這麼簡單的字還問我！」爺爺一拍桌子，哭笑不得地說：「那你何必還學寫中文字呢，以後就學狗『汪汪』叫幾聲表達意思就算了。」

可想而知，當時我們孫孫倆的關係有時是如同「紅衛兵鬥老古董」般緊張的。年輕的我愚昧自大，只愛唱演革命歌曲玩些小把戲，想起真是

那麼地無知又可氣。假如我的少年不是長在「文革」年代，父母定會注重培養我的閱讀好習慣，只有這樣，我才夠資格做爺爺的好孫女吧！

當我們抵達劍橋大學圖書館一個小時後，Hugh特別高興地告訴我找到了爺爺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三年在劍橋橋生活工作的一些記載。他是當時唯一受聘時間最長，教授中國文學的中國學者。也就在那時，他培養的三個孩子已從牛津畢業，先後回到新中國北京，積極投身於促進國際文化交流的重要工作中。爺爺這部《王寶川》在西方戲劇文化界的轟動成就，的確為我們家帶來了可觀的好運氣。

為更深入地了解《王寶川》吸引英國人的關注及共鳴的原因，我們專程拜訪了在倫敦大學皇家霍洛威學院教戲劇的高級講師 Dr. Ashley Thorpe。出乎意料的是，站在我們面前的是一位土生土長、年輕英俊、充滿活力的英國藝術家。自博士時專攻中國京劇以來，他一直熱衷研究東方文化藝術戲劇，尤其將《王寶川》作為重點研究對象。他說，在上世紀三十年代，西方人對中國感覺神秘又陌生，熊式一選擇中國家喻戶曉的

古典愛情故事，英式話劇《王寶川》是由中國京劇《紅鬃烈馬》改編而來，運用西式的幽默風趣和浪漫情感的表達手法，充分演繹出中國人善良、忠誠、聰慧、上進的可貴品格，並讓西方人為角色鮮明的特性而動容和震撼。做到了雅俗共賞，連演三年九百多場不衰。

他說，熊式一地道流暢的風趣語言，和十足的英式幽默諷刺感，充滿着童話情懷和喜劇色彩的演繹，以至於許多《王寶川》的愛好者誤認為熊式一定是一位本土英國作家。與熊式一的英式話劇相比，梅蘭芳的京劇對英國觀眾比較少了些易理解的共鳴力，或許就是因為後者缺乏這種英式幽默和語言習慣吧！

在 Ashley 積極爭取和大學的支持下，經過近一年的努力，他終於以創新的「劇中帶劇」的現代表演手法，再次重演《王寶川》。當西方演員們穿着那些來自中國古代的「奇裝異服」上台之後，觀眾們掌聲不斷，使得 Ashley 倍受鼓舞，特別是聽到有些觀眾感慨地說「我們小時候也會在學校裏表演過這個劇碼，看着這種新式的演出給我帶來多麼美好的回憶」而感到驕傲！（三）



◀今年秋季熊繼周(左)與丈夫Hugh(右)同拜訪Ashley(右)作者供圖